

# 論 点 摘 編

## 资源型城市创新生态系统动态演化

武英凯、徐君在《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撰文指出,资源型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有序构建和良性运转对促进城市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资源型城市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阶段性特征较一般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更加显著。资源型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具备若干特征,并受到多种动力机制影响。其中,演化特征主要包括协同性、裂变性、自组织性以及空间异质性,演化机制则包含技术拉动机制、市场推动机制、政策促动机制以及环境驱动机制。对于极易失稳的资源型城市创新生态系统而言,政府是系统的“舵手”,对引导创新主体乃至整个系统的发展负有重大责任;而科学及时的政策则是帮助系统破除资源诅咒的有形的手,对于资源型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平稳演化至关重要。因此,要对资源型城市创新生态系统展开实时监控和动态管理,将系统的再生行为贯穿于城市发展的始终。要促进创新主体交流与合作,形成创新合力。要加强高校建设与管理,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与地区影响力。

## 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工作的现实审视及基本经验

刘吕红在《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撰文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工作的百年史,既是一部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奋斗史,也是一部与时俱进、因时而化的创新史,又是一部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发展史,更是一部不断取得胜利、创造伟大成就的辉煌史。回顾这一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不同历史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领导人民在城市中进行了武装斗争、开展了生产建设、推进了改革开放、实现了跨越发展,彰显了党领导城市工作的能力、策略与方法,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城市现代化道路。立足于当代实践,应

加强党的建设以领导城市工作、端正指导思想以推动城市改革、尊重顺应规律以促进城市发展、坚守人民立场以开展城市建设、立足具体实际以进行城市规划、适应时代要求以提升城市管理,进而不断推动党领导城市工作走向高质量发展深化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工作的百年经验在于,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探索和认清中国城市发展的特殊规律,必须恪守和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必须把握和遵循“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原则。

## 二程理学是中原学的灵魂

魏涛在《黄河科技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撰文指出,作为对北宋以前中原文化整体提升产物的二程理学,是中原文化中最为精粹的部分。它充分吸收了历史上的佛、道、墨等诸家思想,熔铸出一种新的理论体系,为从根本上实现儒家伦理纲常进入寻常百姓家建构起了完整的传承谱系,有效回答了人们的伦理行为的根本动力和至高规约问题。二程理学应当成为中原学构建时所应充分重视的灵魂性文化要素,应当成为显豁出鲜明中原特色的文化标识性的思想资源,也应当是中原学建构的核心与枢纽之所在。抓住了二程理学的核心价值,也就把握住了当代中原学理论构建的关键。

## 智能化金融监管的实践策略

乔宇锋在《南方金融》2021年第4期撰文指出,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技术支撑的智能化金融监管,具有多种应用维度,能够有效防范金融科技创新风险和金融大数据垄断。智能化金融监管实现了“让数据自己说话”,与传统监管模式相比,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和可伸缩操作特点,有利于解决监管套利、监管滞后和监管模糊等问题。监管沙箱和金融

创新生态体系是智能化监管行之有效的模型框架和实践策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金融科技创新监管的三元悖论,在保持金融科技创新活力的同时提高监管的反应速度和动态化能力。为构建智能化金融监管体系,监管机构需要树立新的监管理念,充分发挥智能化监管的操作优势,正视金融科技创新及其风险,提高大数据获取能力,深化监管改革,助力金融实现高质量发展。

### 思想政治教育应用型知识的定位与生成

蔡如军在《思想理论教育》2021年第5期撰文指出,由于停留于经验科学和理论思辨的两端,缺乏对现实的有效关注,思想政治教育应用型知识生成不足和实践乏力问题并存。思想政治教育应用型知识应定位为一种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情境和个体行动中生成的实践智慧。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过程中,实践者基于长期的教育信念认同、知识积累和实践反思而逐渐形成的一种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行动能力。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的生成发展要植根实践,构建知行合一机制,落实和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者的行动中,转化为实践者的综合素质与能力。

### 诚中形外:儒学工夫论的思想架构

李景林、赵娴京在《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撰文指出,儒学以生命存在的实现为思想的进路,其所言达道,是一种身心上的体证和实践上的拥有,儒家哲学由此而有工夫与工夫论之说。儒家言工夫,包括“成己”“成物”内外两面之统一,其思想架构,可用《学》《庸》“诚中形外”的观念来提挈概括。“成己”着重于个体生命整体性的实现,人的实存表现既因内在本体性的确立和贯通而臻于精纯或“纯一性”,又在生命历程中展现为一种生生连续的“同一性”,获得生命存在之整体性的迁化和本质性的升华,成为道体、天理所依之以全幅必然展现的一种当下性的场域。“成物”着重于君子德化天下的教化作用。儒家讲“诚中形外”,是要通过成己以成物的途径,达成人己、物我一体相通和平等性的价值实现,此亦儒家落实其教化的途径。

##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考验的历史考察及启示

何云峰在《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撰文指出,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遭遇到至少五次重大考验:大革命的失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大跃进”运动的失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面、1989年政治风波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每次遇到重大考验,党总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成功地应对考验,并打开新局面。这给我们带来深刻的启示:在重大考验面前,要坚定信念,勇于面对困难和挑战;要全面辩证地分析形势,冷静反思,查找不足,认真纠正工作中的失误;要解放思想,敢于打破各种条条框框,以新思路开新局;要搞好调查研究,向人民群众求取真理。

### 普惠哲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杨建坡在《中州学刊》2021年第4期撰文指出,普惠哲学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思想中的“反映”与“把握”,是一种世界多样平等、人类共进共享共生与利益共同的共生普惠的价值理念。在哲学立场上,普惠哲学以人的逻辑超越资本的逻辑;在哲学理念上,以普惠价值超越普世价值;在思维方式上,以平等包容超越主体统治客体;在理论建构上,以普惠文明论超越西方中心论。就本质而言,普惠哲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集中体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理念、重大主张上,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哲学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是对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的解答,其在哲学上的表达就是普惠哲学。

### 党的政治领导力的理论渊源

陈文新在《学术界》2021年第4期撰文指出,政治领导力命题是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智慧的话语表达。政治领导力命题的提出本身也是中国共产党对政治领导规律的探寻过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党理论、毛泽东关于党的政治领导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为党的政治领导力提供了话语源头和思想铺垫。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立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党建思想,提出政治领导力命题,这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特别是党的政治领导、政治能力建设理论的继承和创新性发展。政治领导力概念将过去与现实的政治话语联系在一起,既体现了执政党对政治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也彰显了新时代执政党的政治决心和政治勇气,是历史的纵深和现实的广度的有机统一。只有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建的政治话语中梳理和把握,才能真正明确和领悟政治领导力的时代蕴涵。

### 历史政治学视域下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

赵成福、田杨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撰文指出,现代国家建构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范畴,从中西方国家建构的理论源头来看,韦伯的国家能力观和马克思的阶级观构成了国家建构难以回避的价值主张。从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范式出发,以“大一统”的概念审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统一与和平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历史的总基调,连续与传承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基本特征。主权维护、基层治理、体制吸纳与文化认同四个具体维度构成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内涵。就历史政治学视角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研究而言,必须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维度与机制置放于历史纵深感的大环境中加以考察与审视。

### 红色文化的基因传承

李燕在《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21年第4期撰文指出,红色文化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代救亡文化、五四新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历史流变中逐渐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忧患意识、爱国主义精神、舍生取义生死观是红色文化生成的精神基元。这些精神基元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下,转化为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近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和革命献身精神,并由此开启了红色文化的端绪。五四新文化是近代救亡文化发展的高潮,它体现出的爱国主义精神、民主科学精神和革命进取精神成为红色文化的直接精神来源。“五四”以后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赋予了红色文

化鲜明的民族气质和革命品格,并丰富了红色文化的载体形式。

### 媒体化政治的含义与特征

周智、卫飞在《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媒体化政治是政治过程依赖媒体技术予以展开的政治形态,具有政治过程依赖媒体予以展开、媒体逻辑影响政治逻辑、政治权力更接近于大众、形象政治成为政治过程的核心等四个基本特征。作为一种新型政治形态,媒体化政治虽然在促进政治民主化、提升政府能力、提高政治监督效能等各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也存在对既有政治秩序的挑战、严重影响政治稳定和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等消极作用。

### 城乡差距、人口流动与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李恒在《南都学坛》在2021年第4期撰文指出,城乡差距体现了二元结构所具有的刚性和系统性,也是约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阻碍。乡村振兴需要建立在乡村人口城市化的基础上,人口由农业农村向城市现代产业的流动改变了劳动者的收入性质,缩小了城乡差距并推进了乡村现代化进程。乡村人口向城市的有序转移不但奠定了乡村振兴的前提,并通过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带动了乡村产业现代化,推动乡村收入结构多样化,形成了城乡消费融合新格局。

### 财政分权视角下地方政府债务责任追究制度的构建

岳红举在《地方财政研究》2021年第4期撰文指出,地方政府债务责任追究制度面临《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责任条款失效、配套体系缺失以及内部化、行政化等困境,导致债务总量激增、隐性债务泛滥、支出效率低下以及违法举债担保事件频发等问题。作为债务管理体制的核心内容,责任追究制度不仅是地方财政事权,更是中央财政事权。基于绩效管理的全面实施,责任追究制度应立足于绩效管理,构建合法性与合理性并重、债务收入与债务支出并重,以及微观、中观与宏观并重的债务问责路径。

## 地方政府大数据管理机构变革： 定位、挑战与行动路径

耿亚东在《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撰文指出,地方政府作为大数据治理的关键主体与实践者,在数据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第八次机构改革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组建大数据管理机构,以期打破数据孤岛、实现数据整合,优化政务服务、提高行政效率,挖掘数据价值、保障数据安全。各地大数据管理机构的设置仍处于探索阶段,在如何处理数据“量”与数据“质”之间、数据开放赋权与数据安全责任之间关系,应对数据治理与人才、技术发展不协调和不平衡之间的矛盾等方面面临着诸多挑战,致使数据管理常常滞后于政务服务实践。地方政府需要从引入大数据生命周期管理和区块链技术以及多元治理主体间的合作创新等方面寻求解决办法并做出行动。

###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融合创新的伦理省思

张瑞敏在《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撰文指出,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与大数据的融合创新过程中,呈现出隐私侵犯、信息茧房、智能依赖、评价定势等伦理风险,对于保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价值前提造成了威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融合创新出现伦理风险,与大数据应用主体泛化后的利益寻租、大数据本身潜在功能具有的伦理诱因、大数据应用过程中外在保障和约束机制的不完备息息相关。针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创新过程中遭遇的伦理风险,当前亟待重塑积极的技术伦理观,谨守大数据应用的伦理原则,不断完善大数据应用的伦理保障机制,从而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创新营造良好环境,进而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的融合发展。

### 行政规范性文件效力的废除困境及其化解

袁勇在《行政法学研究》2021年第5期撰文指出,行政规范性文件效力的废除困境是制定机关不及时废除生效,裁判载明的当属无效文件效力导致的不良情境;其中隐含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主审

法院之间的多重冲突。由于法院的废除建议作用较弱,制定机关不愿采纳,且其他机关难以相助以致废除困境的发生概率较高,危害后果较重。根据文件效力的严格概念以及文件不合法情形的两层三级分类法,法院通过识别文件情形并分级裁判,不仅能直接根除这类困境,还能更有效地维护法制统一,更有力地推进法治体系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

### “美在关系说”与领导者的共情难题和自解方略

沙家强在《领导科学》2021·5月(上)撰文指出,共情的核心在于人与人关系的处理如何向美向善,这与狄德罗“美在关系说”的核心精髓是一致的。通过“美在关系说”对领导者共情问题进行美学意义上的考察可以发现,自我中心主义导致认知偏见,未能唤醒“实在的关系”;实用功利主义导致无法真情融入,未能唤醒“相对的关系”;信念缺失导致无法形成情感共同体,未能唤醒“虚构的关系”。这是领导者面临的三个共情难题。为此,领导者应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自解:专注认知共情,唤醒“实在的关系”;培育情感共情,唤醒“相对的关系”;创造信念共情,唤醒“虚构的关系”。

###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与实现路径

王海杰、齐秀琳在《当代经济研究》2021年第5期撰文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双循环”的逻辑起点是商品体的内在矛盾,基本条件是社会生产的顺利进行,循环模式包括链式循环、网式循环和社会循环,循环的根本动力是资本的逐利性。“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底层逻辑是市场机制,但自发、自然的循环系统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并最终导致循环系统的崩坏。政府应适度介入经济运行过程,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劳动导向的制度系统设计、异质经济体之间交易规则的制定、跨周期宏观调控与有为政府作用发挥,保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现。

### 我国农业劳动力城乡流动的嬗变、导向与双向互动

夏金梅、孔祥利在《经济问题》2021年第6期撰文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国农业劳动力历经

“乡—城”自由流动(1921—1958年)、“乡—城”限制流动(1958—1978年)、“乡—城”流动破冰(1978—1992年)、“乡—城”流动迅速回暖(1992—2012年)、“乡—城”“城—乡”双向流动(2012年至今)五个阶段;农业劳动力流动表现出战略需求导向、户籍价值导向及家庭迁移导向;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要求农业劳动力城乡双向互动,为此,一方面要提升城市对农业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持续“库兹涅茨过程”;另一方面要让农村农业主动释放更多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防范“逆库兹涅茨过程”。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联动,方能促进城乡融合,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马克思人学基础

张富文在《理论导刊》2021年第6期撰文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符合马克思人学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人学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人性基础、动力基础、价值基础、历史基础。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人性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的本质展开的内在应有之义;马克思人的需要理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动力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的社会性需要在世界图景中的呈现;马克思人的利益理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人的利益生成和发展规律,体现人类的共同利益;马克思人的历史理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历史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依据人的发展的历史形态,表征人的发展的现实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人为的”与“为人的”辩证统一,是“依靠人民”与“为了人民”的辩证统一,是世界人民共同建设与世界人民共同享有的辩证统一。

### 礼乐美学与传统中国

刘成纪在《学术月刊》2021年第6期撰文指出,在现代形态的历史研究中,人们可以拈出种种概念为中国历史定性,但没有哪一个概念像礼乐一样对中国历史形成了既深且巨的影响。人们可以用它界定中国文明、文化、政治、制度的性质,相应把中国文明称为礼乐文明,文化称为礼乐文化,政治制度称为礼乐政治和礼乐制度,但从本质上看,它却奠基于美和艺术。其中,礼主要指人行为的雅化、典礼艺术和

礼仪美术,乐指涉诗、乐、舞。礼乐概念是对两种美和艺术形式的综合。以此为背景,美之于传统中国的价值被彰显出来。可以认为,以礼乐为标识的美学传统是中华民族最具奠基性的传统,以尚文为宗旨的礼乐精神构成了民族精神的灵魂。据此,设置一个礼乐美学,有助于申明美学之于中国人文历史的主干地位,并可使中国美学史研究摆脱种种窠臼,变得与国家历史等量齐观起来。

### 作为数据权益客体的数据集合

赵加兵在《河北法学》在2021年第7期撰文指出,数据权益是指数据管控者对其管控的数据享有的权益。这种权益应受民事法律保护。但对于数据权益客体为何,理论界存在争议,形成了“数据非客体论”“数据信息论”及“数据文件论”等观点。从规范精当角度而言,将数据权益客体界定为“数据集合”较为合适。“数据集合”是指由一定数量的符号化数据按照某种目的汇集在一起而形成的数据包。以“数据集合”概念统领数据权益客体范畴既符合数据权益客体研究的基本方向,也契合民事权利客体体系发展的内在需求,还吻合数据要素市场建构的实践目标。对比“数据集合”与传统民事权利客体可知,“数据集合”是有别于物、知识产品及人格利益的新型民事权利客体。“数据集合”作为权利客体所具有的可区别性及可识别性应采取有别于传统民事权利客体的确定和公示机制。“数据集合”区别机制建构可采取事后判断模式,“数据集合”识别机制建构可采取交易确定模式。

### “两个大局”下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大方略

丁声俊在《粮食问题研究》2021年第7期撰文指出,在新发展观引领下,我国必须统筹谋划保障粮食安全新方略。在坚持我国制度体系及弘扬其优势的保障下,必须采取九大方略:加强道路自信,牢牢掌握粮食主动权;应对百年未有大变局,构建粮食“双循环”发展新格局;进一步建立国内粮食产需基本平衡体系,为构建粮食“双循环”新格局打牢基础;善于把“两手”结合并用,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加快培育和扩大国内消费的战略基点,强化农业粮食发展新引

擎;发展现代大流通,增强构建粮食“双循环”新格局的活力;守住管好“天下粮仓”,进一步加强“定海神针”;建立健全粮食物流系统,畅通粮食“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大动脉;以科技为武器,筑牢农业粮食生物安全防线。

### 转型期乡村文化治理的实践困境及应对策略

张敬燕在《领导科学》2021·7月(下)撰文指出,有效的文化治理由多种要素和力量长期交织碰撞形成,具有明显的结构性、对照性和适用性三重特质。这三重特质形成了极具稳定性的治理结构,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导向。当前,乡村文化治理的困境表现为乡村文化遭遇裂变、乡村文化治理的“空心化”、乡村文化治理的导向偏离、乡村文化治理的组织基础弱化等。创新乡村振兴的文化治理路径,要搭建乡村文化治理的整体架构,培育文化治理的价值基础,增强乡村文化治理的经济基础,夯实乡村文化治理的资源供给基础。

### 中国传统“中和”思想的伦理内涵及其方法论意义

魏长领在《河南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撰文指出,“中和”具有多层次的内涵,贯穿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宇宙本体论、生成演化论、社会历史观、认识论、价值观和伦理思想之中。中国传统“中和”伦理思想是中国传统“中和”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中和”伦理思想内涵丰富,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个人活动的方方面面,体现着人们对宇宙、社会、人生、自然的总体认识、价值理想和行为准则,具有广泛渗透性和普适性。中国传统“中和”伦理思想既是一种理想的道德价值目标,也是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道德规范,还是个人应该具备的道德品质或德性,同时,“执两用中”“过犹不及”“和而不同”“时中”也是调节社会道德关系和个人道德选择的重要方法论,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等各种社会关系。

### 转型期乡村振兴的依托基础、现实困境及重构路径

刘涛在《农业经济》2021年第8期撰文指出,乡

村文化是民族的文化根基和中华文化的原点,也是乡村振兴的灵魂。多元的生态环境、小农户家庭经营、熟人社会的道德秩序和地方治理规则等共同构成乡村文化的基础体系。随着现代性因素的进入,传统的乡村社会图景发生改变,出现了传统伦理规范弱化、农民精神文化主体性缺乏、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式微、乡村文化建设适应性不够等问题。需要重构乡村文化振兴的理念,引导文化建设融入日常生活,构筑乡村文化振兴的产业基础,培育乡村文化振兴的本土人才队伍,以文化振兴引导乡村的全面振兴。

### 闲暇时间配置对个体创造力的影响机制与对策

夏杰长、徐紫嫣、王鹏飞在《中国流通经济》2021年第8期撰文指出,微观个体在闲暇时间内积极的休闲活动可以通过释放压力、激发右脑活力、提高耐心程度三种途径提高个体创造力。这意味着,培养创新型人才,既要关注其在知识型学习上的教育方式与实施效果,更要关注闲暇时间在培养个体创造力、非认知能力以及性格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引导大家选择积极的休闲活动、健康的生活方式,改善全民族休闲质量,提高全民族创新精神与工作绩效。由此,为更好地打开闲暇时间作用于经济系统的创新通道,提高个体创造力,需要增加闲暇时间,优化工作与闲暇时间配置;需要推行弹性工作制,营造宽松工作环境;需要发挥闲暇教育对个体创造力的促进作用,适应创新型社会需要;需要关注个体性格特征,重视闲暇时间对非认知能力培养的作用;需要弱化个体社会时间偏好,提高个体耐心程度。

### 乡村治理视域下新乡贤文化的培育

梁爱强在《经济研究导刊》2021年第11期撰文指出,有效的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前提和基础。乡村治理需要新乡贤文化,因为新乡贤文化是乡村治理的品质追求,新乡贤文化凝聚乡村治理的人才力量,新乡贤文化促进乡风文明。培育新乡贤文化,要坚持以强化党建引领为前提,夯实培育新乡贤文化的社会基础,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引领功能,积极营造培育新乡贤文化的舆论环境,壮大和强化新乡贤队伍。